

## 第四章 成為日本人： 「本島我」與「皇民我」想像的糾纏

住在割讓給日本的地方上的住民，如果願意居住在上述割讓地以外的地方者……從本條約批准換文的時日開始 2 年為期限，但是在上述年限內沒有離開該地方的住民，應作為日本的臣民行事。

### —— 中日〈馬關條約〉第 5 款

儘管日本據台初期，對屬於異民族的台灣住民，如同前述福澤諭吉的主張，曾有過「只以土地為目的，島民之有無不置於眼中」、「即使全島島民悉數退出境外亦不為過」等如此殘酷苛刻的台灣統治論調，<sup>1</sup>也如同西川滿書中所描述的，曾有人有過「希望快一點把清國人都從台灣趕走，以建立大和民族的新天地，吐出這種勇壯活潑的意見」，<sup>2</sup>而福澤、西川這些「勇壯活潑的意見」，絕非僅止於學者空談或小說敘事之類的憑空臆測之言，事實上，從總督府官方文件中，對於此一問題的討論，也曾產生了「放逐」與「留用」台灣住民的兩派不同意見，但經多方考慮與評估，最終還是依照〈馬關條約〉第 5 款，讓台灣住民在 2 年之內得以自由選擇國籍，<sup>3</sup>而據統計，在 1897 年 5 月 8 日的最終期限結束時，登記離台者只有一部分大資產家、由大陸移來的官僚，或主要的生活地盤在對岸，只

<sup>1</sup> 轉引自吳密察，「福澤諭吉的台灣論」，*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 年），頁 92。

<sup>2</sup>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藝術公司，2005 年），頁 124。

<sup>3</sup>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領台初期對本島人及清國人的處理情況」，*台灣抗日運動史（四）*（原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008-1018。

是來台灣工作者共 5,460 人，<sup>4</sup>約佔當時台灣總人口 280 萬的 0.2%，換言之，絕大多數迫於無奈形勢下的住民選擇了留在台灣，成為日本此一新興殖民帝國下的「新臣民」。

在日本對於「留用」的這些台灣「新臣民」之處理方針上，評估「以戰勝之餘威用武力強制推行日本化（同化）主義似可取得成效，且在理論上似無缺陷，但對照海外諸國之殖民史考慮，亦頗屬至難之業。如急於求成最後反而會多勞而無功」，<sup>5</sup>加上抗日義軍此起彼落，因此，據台初期日本總督對台灣住民只好暫時採取綏撫、放任的統治方針，並標榜為順應現實需要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政策，日後後藤新平更引申改良，並美其名為「生物學原理」的統治方式。然而，此種「綏撫」、「放任」充其量也僅為一種手段，其目的仍在於確保島內穩定，徐圖永遠解決問題，並希冀隨著日後移民的增加，工、商業之發達及教育之進步，以期逐步將島民的人格、思想「日本化」，並成為「忠良」、「忠誠」的日本人。

## 第一節 從「同化」到「皇民化」：論述與操作

### 一、「同化政策」的論述與操作

#### （一）代表性論述方面：

雖然「同化政策」自日本佔據台灣以來，即是行政官僚、殖民政策所者所「宣稱」為殖民統治台灣的應行政策，然而直到 1918 年第 7 任明石總督上任後始告確定，繼任者首任文官田總督更奉該政策作為重要施政方針，惟在代表性論述方面，表現在兩任總督就職時宣告的施政方針上，卻有相當的差異之處，亦即明石總督指出「夫台灣施政，在乎感化島民，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是為本總督統治之目標」之時，對台灣住民成為「日本人」，尚存漸進、感化與撫慰之意；然而，及至田總督時，除了重申「同化政策」的精神就是「內地延長主義」，以及

<sup>4</sup> 倘若依據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對遷離者的類別所作之分析，歸納得出包括「在清國內地有財產者」、「居無定所之工人」、「為流言巷議所惑者」、「躲避鼠疫者」等 4 種人，更認為任何一種都無任何政治上之意義，多為迷於思念故國之念與流言蜚語而「選錯方向」。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領台初期對本島人及清國人的處理情況」，頁 1039-1040。

<sup>5</sup>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領台初期對本島人及清國人的處理情況」，頁 1008-1009。

再次「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之外，更赤裸裸地總結性地宣告採取該政策之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此外，如同荊子馨所追問的，這裡所引申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即是為何日本殖民者要選在「同化政策」普遍遭到國外殖民政府揚棄（例如法國、英國等），以及飽受國內殖民政策學者道德非難（例如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等）的時間點上（1918年至1919年），不顧一切執意採取該政策？<sup>6</sup>對此問題，前述矢內原已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中提出了答案，基本上他認為在這時間點之前，殖民統治是承認了台灣的「特殊性」認識，之後則是將之納入了日本帝國的「普遍性」要求。他進一步分析這樣的變化，是因為受到島內及島外，特別是日本及中國的情勢變化所致。就日本的情勢言，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帝國主義與社會運動的發展漸趨深化；就中國的情勢言，國民政府所開展的一種民族主義式「反帝國主義運動」亦見蓬勃發展；就台灣的情勢言，深受中國與日本兩大國的影響，除政治上島內的民族運動漸次開展外，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擴張到中國大陸，經濟上更被進一步整併到日本的南進政策上。因此，依據矢內原來看，「同化政策」主要就是用來抑制或緩和殖民地內部的民族運動，並將其經濟利益擴張到南中國與東南亞，這樣的看法與前述田總督的總結，並無太大扞格之處，同樣是屬於「殖民國本位主義」的考量，這也就是矢內原為何不諱言地將此等「同化政策」、「內地延長主義」，斥責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新衣服」的緣由了。

### （二）具體性操作方面：

依據上述的論述，自田總督以降的8任文官總督，均抱持著「同化政策」的方針，標榜內台融合，一視同仁，其具體性操作方面包括：<sup>7</sup>1、在地方自治上，1920年10月，發布地方制度改革，制定州、市、街庄制度，並各設協議會，由選派之地方御用士紳擔任各級協議會員，惟依其功能而言，僅是作為徒具形式的諮詢機關而已，此後歷經台灣住民10餘年的請願與努力，1935年4月，殖民當局始改州、市會作為議決機關，廳及街庄則仍設協議會如前，且雖確立選舉制度，惟仍規定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官派、民選各半產生，州會議員則由總督任命、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各半產生；2、在經濟上，1920年以降，歷任

<sup>6</sup> Leo T. S. Ching,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mperialization: From Colonial Project to Imperial Subject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 p.100.

<sup>7</sup> 吳文星，「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政策之演變」，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編，*講義彙編*（南投：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1997年）。

總督均以「振興產業」為己任，而台灣產業的振興，亦相對支撐起殖民當局「南進」的動力，1931年起，「工業化」的台灣，更作為軍需品的生產基地與南進的補給基地，無疑地，台灣已成為日本殖民帝國「南進政策」不可或缺的一環了；3、在法律上，1921年制定「法三號」取代了「三一法」（規定總督之命令，不得與日本本國的法律和敕令相牴觸），標榜日本本國的法律原則上亦適用於台灣，從而限縮了總督的律令制定權，僅止於因台灣的特殊情況而必要之時；4、在學校教育上，1922年公布的「新台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美其名為「內台共學制」。此後，除在各地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等之外，另創立高等農林、商業及工業學校、醫學專門學校，並於1928年設立為台人所詬病象徵性高於普及性的台北帝國大學。因此，表面上，台人似乎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學校，然而實際上差別待遇的本質不變，最大的受益群體仍舊是在台的日人子弟；5、在社會教化上，重點工作在於推動普及日語、革新風氣、矯正陋習、打破迷信等任務，並強調「貫徹皇國精神，努力強化國民意識」，進而展開「民風作興運動」，以「國民精神之振作」與「同化之徹底」作為運動的兩大目標，在在都顯示殖民當局對「同化」程度的要求不斷增強，希冀透過社會教化運動的手段來力求貫徹。

整體而言，日本殖民者所推動的「同化政策」，表面上雖然蘊含著一種對於台灣住民要求自治聲浪的「創造性模糊」空間，然而這種「模糊」其實也有其「底限」的存在，且任何人，即便是部分較為開明且同情台灣住民的日本政治家、知識分子，也都不得超越其設定的「底限」，例如此前（1914年12月）一度使台灣人民充滿希望及幻想，而由日本明治維新元勳板垣退助（1837-1919）所倡議設立的「台灣同化會」，台灣文化、民族運動先趨者林獻堂在拜訪內田總督尋求支持時，內田竟答稱「同化會之主旨好極了，正與本官所持方針吻合，唯政治如利刃，若使小孩玩弄，實為危險千萬，君等為地方先覺，請指導民眾無使近之，以防不測」，<sup>8</sup>此等將台灣人所苦心追求的民族、自治運動視為「小孩玩弄」般的不當比喻，充分暴露了殖民者高傲的一面，而「同化會」也果然在台僅僅成立1個多月，即受到內田總督以政府力量進行無情打壓及下令解散；<sup>9</sup>此後，亦有矢

<sup>8</sup> 司馬嘯青，*台灣日本總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5年），頁249。

<sup>9</sup> 板垣退助曾於1914年3月接受台灣民族運動先驅者林獻堂之邀來台參訪，返回東京後，發表了旅台的意見〈台灣之急務〉，謂之日本擁有台灣，雖得其土，未得其民，終非國家之福，為此主張應以「同化主義」來修正目前的缺陷，並倡議設立「台灣同化會」。而台灣人接受「台灣同化會」宗旨所說的「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權利待遇」，而包括總督府在內的在台日本人則採取同化會的另一宗旨：「化育台灣人使其與日本人同化」，殖民者「盡（化育）義務」與被殖民者「享（平等）權利」之間的歧異認知，觸及了在台特權階級日人的敏感神經，事實上早已注定了同化

內原忠雄、細川嘉六等人對台灣仗義執言，惟均如「狗吠火車」般充滿了無奈與失望。總之，殖民當局推動的「同化」政策，盡殖民者「化育」台人的義務是實，讓台人享「平等」的權利是虛，1925年蔡培火（1888-1983）在獄中所作的〈台灣自治歌〉，歌詞有：「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台灣全島快自治，公事阮掌才應該……百般義務咱都盡，自治權利應當享」，如實地唱出了被殖民者渴望「平等」的當下心聲。而這種表面上帶有「一視同仁」性質的「同化」政策，直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發前夕，由於戰爭的日益迫近，一舉而為日本殖民者大力倡導的「皇民化」運動所替換。

## 二、「皇民化」運動的論述與操作

### （一）代表性論述方面：

「皇民化」意味著讓非大和民族的人，包括台灣、朝鮮等殖民地住民，也能成為天皇的子民。而「皇民化」運動就是強化皇國精神的運動，這本是源自於1931年皇道派代表人物荒木貞夫出任陸軍大臣後，將日本「國軍」改稱「皇軍」，軍校徽章亦改以皇室的16瓣菊花紋章，用以象徵直屬天皇，來強化「皇軍」意識，因而產生高人一等的幻覺，<sup>10</sup>此後這種皇民意識即高漲不已，連帶亦波及台灣，台灣軍並率先倡導「皇民化」運動，<sup>11</sup>惟直至1936年第17任小林總督上任，標榜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作為施政的3大基本方針，並指出：「同化的事實，這一直是日本統治台灣堅定且不變的政策。鑒於帝國的使命，台灣的地位以及當前的世界局勢，最緊急的任務是讓5百萬島民獲得與日本人同樣的資格，以恢復他們的決心，共同為國家的繁榮奮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透過提升大眾教育，矯正語言風俗，並培養忠誠帝國子民的基礎，以便為帝國精神的推廣貫徹而奮鬥」後，「皇民化」運動在論述方面始告完善。

乍看之下，小林的一席話，似乎「皇民化」即便不是「同化」政策的強化，至少也是其延伸，這使得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有了「堅定且不變的政策」脈絡可循，而這也是研究日本殖民統治的學者所普遍保持的假設。惟關於此一論點，筆者較為贊同荊子馨的觀點，亦即他在比較「同化」與「皇民化」兩種不同的殖民意識形態後，指出基本上「同化」代表了殖民計畫的一般場域，其中並未有一致的哲

---

會短命夭折的命運。

<sup>10</sup> 田中隆吉，*日本軍閥暗闘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頁57-58。

<sup>11</sup> 司馬嘯青，前引書，頁348。

學或系統性政策，此外，由於「政治歧視」與「文化同化」之間的落差所透露出來的內在矛盾，使得「日本化」大體上被表述為一種殖民者的問題意識，亦即一種失敗或尚未實現的殖民理想；而「皇民化」則開創了「日本化」的政策並將之內化為被殖民者——被視為不完整的「皇民」(imperial subject)——的唯一問題意識，也唯有在此一特殊歷史時期的交會點上，有關殖民「認同」的糾纏與掙扎，才確實成為殖民地台灣的主導性論述，在此，「成為日本人」這個議題，滋長出巨大的存在焦慮與政治欲望。因此，他認為「皇民化」藉由隱藏與抹去「同化」的內在衝突，而根本地轉化並限定了殖民主體性與認同可以被容許的表述與再現方式，在此意涵上，「皇民化」既非「同化」的邏輯延伸，亦非「同化」的突然斷裂。<sup>12</sup>本文在第五章的分析，亦對荊子馨的觀點提出了相關討論。

## (二) 具體性操作方面：

依據上述的論點，自小林總督以降的 3 任後期武官總督，所開始計畫且具體性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內容概分 4 大部分：<sup>13</sup>1、在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造上，殖民當局以日本國家神道取代、壓抑被殖民地的傳統的宗教，例如藉由「改善正廳」運動，將台灣住民原來正廳供奉的觀世音菩薩，換成日本的「天照大神」，並且要求台灣人放棄「媽祖」、「城隍爺」等民間諸神，改立日本神社，並和日本人一樣地參拜。此外，「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改變台灣人的食衣住行等生活方式，過著一種日本式的「皇風生活」；2、在「國語運動」上，由於日本殖民者認為國語（日語）就是「日本人精神上的血液」，因此講日語是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之必備條件，且為增進一般大眾的日語能力，總督府在全島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而符合殖民者標準的家庭被稱為「國語家庭」，不僅成為眾人的模範，且在實質生活上還享有就學、服公職等特別優惠，此外，還連帶廢止報紙的漢文欄，並禁止使用「方言」（漢語），「國語運動」儼然成為全面性的日語普及運動；3、在改姓名上，1940 年公布「台籍民改換日姓名促進綱要」，其方法亦是偏重獎勵，規定「改姓」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並非一般人可為，此舉係將「改姓」塑造為十分崇高且具有榮譽的活動，因此對於當時台灣青年而言，「改姓」就如同爭取「國語家庭」的認定一樣，可獲得具體的利益，更是爬陞社會階梯的一條捷徑；4、在志願兵制度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前，台灣住民並無服兵役的義

<sup>12</sup> Leo T. S. Ching,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mperialization: From Colonial Project to Imperial Subjects," p.91.

<sup>13</sup> 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動運（1937-1945）」，*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年），頁 41-72；張倩雯，「『皇民化』是將台灣人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嗎？」，<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takeo-28.asp>。

務，1942年殖民當局才實施「台灣特別志願兵制度」，徵調台灣青年為軍伕，前往中國大陸與南洋各地為日軍服務，據統計1944年全台志願兵總數已達75萬9千多人，對此「志願性」服兵役的踴躍情況，第18任長谷川總督則曾認定為「台灣統治史上輝煌最高至大的榮譽志願兵制，達成了島民多年的翹望」，<sup>14</sup>此外，直至1945年，為補足日本兵源，才開始實施「徵兵制」，所有役齡男子除非體檢不合格都必須當兵。<sup>15</sup>在殖民當局的認定中，「志願兵制度」似乎已成為測量殖民地青年「皇民化」程度的指標，志願者愈踴躍，表示「皇民化」運動就愈成功。<sup>16</sup>

整體而言，「皇民化」運動所具體推動的各項政策，破壞了台灣的傳統文化，並企圖對台灣人進行精神改造，使他們心存感激地為殖民母國奮鬥，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確保被殖民者對天皇的效忠，以及願意為日本而犧牲。如此也使得先前「同化」運動，所營造的一種與日本人「一視同仁」、「平起平坐」的「平等」意象地位之創造性模糊空間，逐漸走向清晰，然而此種清晰的「平等」意象地位，也只有在人身肉體的消滅後，始能在精神層面上真正獲致，這就是日本台灣文學研究的先行者尾崎秀樹，所一語道破地指出，隨著戰事的升高及動員的強化，「皇民化」對於被殖民者不再意味著「生為日本人」，而是「死為日本鬼」。<sup>17</sup>

## 第二節 台灣媒體輿論的「皇國 / 民」想像

被號稱「身為脫離渾濁世間的權勢且超越名利的吾島民唯一的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sup>18</sup>它起源於1920年留日東京學生蔡培火等人所創辦的《台灣青年》雜誌，其後逐步發展為《台灣》、《台灣民報》，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中國白話文創刊，除語言選擇上的抗爭外，並一直抱持批判統治者的言論立場。1925年《台灣民報》從旬刊改為週刊，發行量突破1萬份，但直至1927年8月，發行地才

<sup>14</sup> 轉引自司馬嘯青，前引書，頁376。

<sup>15</sup> 戰後，依據日本厚生省於1973年4月發表的統計，日據時期台灣出身的軍人多達8萬432名，軍屬（隨軍職工，加上助理性質的軍伕）則多達12萬6,750名，合計20萬7,183名，轉引自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186。

<sup>16</sup> 周婉窈，前引書，頁66。

<sup>17</sup> 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頁106。

<sup>18</sup> 「卷頭之辭」，*台灣青年*，第2卷第5號（大正10年6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台灣民報社論*（台北：稻香出版社，1992年），頁19。

獲准從東京遷回台北，此後刊物大致上採行「漢文版」與「日文版」並存的方式發行。1930年民報社擴大改組為新民報社，接續發行《台灣新民報》，直至1932年4月起始由週刊改為日刊發行，<sup>19</sup>到了1937年發行量已突破5萬大關，同年6月起因侵華戰爭日益迫近而廢止了漢文版，因此，發行日刊雖讓民報社成為名符其實的報社，但廢止漢文版卻等於要求放棄台灣人漢族意識的堅持。1941年2月12日後《台灣新民報》被迫改名為《興南新聞》，直至1944年3月26日在日本戰時新聞統制政策之下，《興南新聞》與島內其他5家主要報社，共同被併入《台灣新報》，至此台灣住民經營的報社媒體乃正式被消滅。<sup>20</sup>有關台灣住民經營報社媒體的歷史沿革，如表4-1。

表 4-1 台灣住民經營報社媒體的歷史沿革

項次	發行者	刊物名稱	發行地	性質	發刊時間
1	日本東京 「台灣青年雜誌社」	《台灣青年》	日本東京	月刊	1920/07- 1922/04
2	日本東京 「台灣雜誌社」	《台灣》	日本東京	月刊	1922/04- 1924/05
3	日本東京 「台灣民報社」	《台灣民報》	日本東京 (1927年8月獲准從東京遷回台灣台北發行)	半月刊、旬刊、週刊(1925年起)	1923/04/15- 1930/03/29
4	台灣台北 「台灣新民報社」	《台灣新民報》	台灣台北	週刊、日刊(1932年4月15日起)	1930/03/29- 1941/02/11
5	台灣台北 「興南新聞社」	《興南新聞》	台灣台北	日刊	1941/02/12- 1944/03/26
6	台灣總督府	《台灣新報》 (1944年3月26日總督府將《興南新聞》與島內《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報》、《台灣新聞》、	台灣台北	日刊	1944/03/26- 1945/08

<sup>19</sup> 關於《台灣新民報》之所以從週刊改為日刊發行，乃是第14任太田總督鑒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幾乎全被政友會，乃至於後藤新平所壟斷，其勢力牢不可破，民政黨幾乎無插足餘地」，於是在1932年1月9日戲劇性地核准了《台灣新民報》的日刊發行權，作為制衡的力量，司馬嘯青據此分析其原因，說穿了完全是在日本政黨鬥爭的夾縫中抓到了一線生機，參見司馬嘯青，前引書，頁264。

<sup>20</sup> 何義麟，「民報：台灣戰後初期最珍貴的史料」，<http://paper.ntl.gov.tw/page/p-00002a.htm>。

		《高雄新報》、《東台灣新報》等五家主要報社合併成立)			
--	--	----------------------------	--	--	--

本節在此囿於能力所限，僅就《台灣青年》至《台灣新民報》週刊版以來(1920年7月至1932年4月)，作為反映人民意志，表達人民呼聲的相關卷頭語、社論等文字史料，作為探究此一時期台灣媒體輿論對日本「皇國／民」想像的重要分析場域。綜合筆者分析所得，這些媒體輿論所關注的焦點議題，同時也可視為對日本「皇國／民」的初期想像，這些想像不外乎：「文明強弱的辯證」、「對台總督的期望」、「『同化政策』的抵制」、「『一視同仁』的假象」、「追求自治的渴望」、「主張平等的教育」、「創造全新的自我」等：

## 一、文明強弱的辯證

輿論雖然不得不承認日本自明治維新「文明開化」以來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也絕不妄自菲薄，自認台灣既屬具有5千年深重文化的漢民族，故謂之「日本開國以來，統治有高度文化的異民族，可算是自我台灣開始」，<sup>21</sup>這裡所指5千年來的「高度文化」，顯然在自我意識上，較日本動輒誇耀近2千6百年的歷史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面對日本殖民帝國向來引以自豪，尚且滔滔不絕、夸夸而談的「文明國」之「使命」時，採取以殖民政策的新／舊、人道／霸道作為區別的判準，認為「舊式的殖民政策是征服的、支配的、軍國的、官僚的、專制的，……沒有以殖民地人民為基礎，皆以本國本位而行種種的政策」、「新時代所要求的殖民政策，就是民眾的、互助的、文化的、平和的、自由的、人道的政策了」，<sup>22</sup>進而敬告日本殖民者，所謂「文明國」之「使命」，只有以「人道的文化政策」啟發被殖民者，才能算是圓滿、完成，而那些藉口民眾幸福，實行特權壟斷，不但是台灣人之苦，更是「文明國」之恥；此外，並以強弱之間的辯證關係來惕勵殖民者：「強者並非恆強，弱者也決不應該永久弱。強者動輒恃其強逞其勢，即成為變弱者的因素；弱者激憤於平素不順的境遇，不怠其努力，則將成為強者的酵母。…因此，世間自誇為所謂強者，宜教化善導弱者，以收大道正義的美果；又自棄為弱者，也須感激奮勉於強者之誠意，以求改造境遇的幸福。相信如此始真

<sup>21</sup> 「何不急設殖民地統治調查機關：政府欠有根本策，議會又沒決斷力」，*台灣民報*，第95號（大正15年3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303。

<sup>22</sup> 「新時代的殖民政策：要放棄舊時代的殖民思想」，*台灣民報*，第2卷第4號（大正13年3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107-109。

正得以超越優劣強弱，實現真正的正義人道自由和平的理想世界」，<sup>23</sup>惟這樣多次發自被殖民者內心的良善呼籲，最後也只能落得「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忽視不論境地，歷任總督對台灣住民的統治政策，仍然無法真正達到統治者口口聲聲中所說以「善政」為目的之積極成果可言。

## 二、對台總督的期望

台灣住民的良善之心，每回對新上任的日本總督，總本著「日夕翹望賢明的政治家，宛若大旱之望雲霓」般，<sup>24</sup>可以說期待之情溢於言表了，例如對於第 9 任內田總督之「久在中央政界…富有殖民的智識，台島諸事經在長官時代熟識，故此回若以前的經驗加以現在的最新智識，施一大手術，久病的台島，一定會活動起來了」、<sup>25</sup>對於第 10 任伊澤總督之「久居貴族院議會之職，對於台灣事情平素頗有關心，至如台灣議會問題也有相當的理解，這回榮任台灣總督，我們相信他必能發揮其敏腕，將向來所有不良的台灣政治大行改造一新，對汲汲乎島民的生計十分致意保護」、<sup>26</sup>對於第 12 任川村總督之「曾任台灣的內務局長，對台灣的事情雖然不得說是完全不知道的，為此有一部分的人對於這點頗有抱期待的」，<sup>27</sup>以及對第 13 任石塚總督之「任過台灣總督府樞要的地位，對台灣的事情是很通達的，…我們是以特別的誠意表示歡迎的」<sup>28</sup>等等評價與期望，惟事實證明，日本的殖民統治，並不會因為新任總督曾任職總督府官吏或熟知台情，而能有一番民主、革新氣息，相反地，渠等施政反倒還可能出現類如內田總督般，既違背民眾期待，又留下不少「惡政」記錄的情事發生，因此，台灣住民一次又一次對這些新任總督的評價與期望，從事後總結來看「都盡是空思妄想」，<sup>29</sup>以至

---

<sup>23</sup> 「從強弱鬥爭到自由平和」，*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4 號（大正 9 年 10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7。

<sup>24</sup> 「歡迎伊澤新總督」，*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7 號（大正 13 年 9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40。

<sup>25</sup> 「行政革新的好機」，*台灣民報*，第 10 號（大正 12 年 11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92。

<sup>26</sup> 「歡迎伊澤新總督」，*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7 號（大正 13 年 9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40。

<sup>27</sup> 「川村新總督蒞任」，*台灣民報*，第 216 號（昭和 3 年 7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550。

<sup>28</sup> 「歡迎石塚總督：並述希望之一端」，*台灣民報*，第 275 號（昭和 4 年 8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690。

<sup>29</sup> 「伊澤總督也要走了」，*台灣民報*，第 113 號（大正 15 年 7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40。

於到了第 14 任太田總督之時，已是「沒有什麼特別興味和期待了」，<sup>30</sup>甚至在經過了幾任總督的「白紙主義」之後，台灣住民更產生了「沒有積極期待其施什麼特別的善政，但只在消極的希望其勿施惡政而已」、「無為的總督實勝在利權搾取上有辣腕的總督」等深刻教訓；<sup>31</sup>此外，也由於輿論對於台灣總督的失望，因而在逐漸對這些統治者官紳的更迭，以及送往迎來感覺乏頓之際，已能激悟「去者儘管去，來者即管來，我們可不必再作空思妄想」的真理，進而更籲請台灣民眾在意識上必須要求自我「看破欲打破舊狀，重建新政，決不是乞哀求憐可以獲得著的」，<sup>32</sup>同時，也必須認知唯有自省自覺，協力猛進去拼命奮鬥，才能達到光天化日的境地。

### 三、「同化政策」的抵制

輿論對於日本殖民者施行的「同化政策」，予以大力抨擊，認為國民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是經過「數百年或數千年訓養而來，故有特別性格，和他國人定有差異，…決非一朝一夕可以改造的」，<sup>33</sup>因此，殖民者若執意「遂行徹底的同化政策，必然會引起使被治者的民族性滅亡，重新注入治者民族性的不自然事象，因此將成為被治者的痛苦，並進而造成激動被化者民族性的結果，終至釀成不達新時代的人道的自治生活不止的氣勢，而為史證的歸結」，<sup>34</sup>輿論更赤裸裸地直指「同化是滅族政策的假面具，自治是共存共榮的秘訣方」；<sup>35</sup>而殖民者為貫徹其「同化政策」的邪惡決心，甚至說出了「若是反對同化政策，須要退去台灣」的威脅重話，<sup>36</sup>對此，輿論大表不滿，認為「退去」原指涉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時，讓台灣住民以 2 年為期，自由選擇國籍及離開台灣之意，而今

<sup>30</sup> 「新總督蒞任：我們已見慣官紳送迎忙」，*台灣新民報*，第 349 號（昭和 6 年 1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861。

<sup>31</sup> 「植民地總督的更迭：於被治者何干」，*台灣民報*，第 214 號（昭和 3 年 6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546。

<sup>32</sup> 「伊澤總督也要走了」，*台灣民報*，第 113 號（大正 15 年 7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40。

<sup>33</sup> 「尊重植民地的國民性就不是同化主義了」，*台灣民報*，第 3 卷第 6 號（大正 14 年 2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86。

<sup>34</sup> 「從同化到自治」，*台灣*，第 3 年第 6 號（大正 11 年 9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46。

<sup>35</sup> 「民報的轉機：台灣統治方針更新的暗示」，*台灣民報*，第 167 號（昭和 2 年 8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448。

<sup>36</sup> 「這句話非同小可」，*台灣民報*，第 2 卷 22 號（大正 13 年 11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55。

（大正 13 年，1924 年）自日本據台已有 30 年之際，而此一重話等於要對台灣住民重新宣告 30 年前的「退去」命令，這不啻表示殖民當局 30 年來的治台政績等於零；此外，輿論認為這句重話亦像是辱罵台灣人為已經滅亡 13 年的「清國奴」一樣，如此已對本島人的心靈造成極大傷害。

#### 四、「一視同仁」的假象

輿論也戳破了殖民當局宣傳「一視同仁」、「共存共榮」、「內台融合」的口號假象，指出「所謂善政，無非是在使內地人利益均沾，機會平等。然而從來的統治方針，概以內地人為本…」，<sup>37</sup>況且實際的情況也是「當我們正主張台人有重大使命的時候，就有人說台灣人不過是殖民地土著民，現時既沒有參與國政的機會，於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俱劣於日本人，想不過都是孜孜營求生活計的人，還有甚麼人能夠談正義人道呢？並且教育上也沒有過高遠的學問，那得有學術者可推廣文化呢？」<sup>38</sup>因此，倘若按照日人的邏輯，此等卑微的台灣住民豈能自誇、主張身懷「重大使命」呢？顯然，「一視同仁」的口號，無論如何也掩飾不了深植於殖民者心中種族優勝劣敗的觀點，此種觀點與行為，表現在日常生活上更是比比皆是，例如起因於違犯校規的小問題，即身為「南師」低年級生的「內地人」，只因高年級生為「本島人」，便不守校規而不願對本島生行禮，這本是小事一樁，只是在雙方的理論過程中，日本舍監舍除明顯偏袒內地生，更反來痛罵本島生的無禮，謂之「對母國人敢有不遜的行動」。一位本應公正執行校規職務的舍監，反而視校規如無物，逕自放縱內地生濫行優越之舉措，甚至日人媒體還趁此嫁禍於致力重建台人心靈的「台灣文化協會」，並發動親日輿論大肆抨擊「本島生之思想惡化，乘文協之宣傳，或有公言排斥母國人，或煽動不穩的行為……一般師範學生的思想是惡化……懷危險思想、咀咒國家、罵倒總督政治、標榜反抗內地人」，且進一步擴大打擊面，謂之「南北兩師範的生徒間，蟠踞的不穩思想，是不可看做一時的現象……當教職時，若利用其地位和職務來努力島民的惡化，就是重大事情啦……由現在的狀態看來，公學的教育未可全然委任於本島人了。……看這危險思想、行為不穩的青年，其大部分是有受過相當的教育，其結

<sup>37</sup> 「豈有不許言論自由的善政嗎」，*台灣民報*，第 3 卷第 3 號（大正 14 年 1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76。

<sup>38</sup> 「台人重大的使命」，*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4 號（大正 13 年 8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33。

果卻與島民教育之目的有相違反……」，<sup>39</sup>而輿論也分析內地人優越感之所以極度膨脹，完全係因得到殖民當局的特別擁護，事事自然要立於台人上方，於是在「不知不覺」當中，對人接物莫不發揮其優越性。最後，輿論指責同樣身為黃種人一分子的日人，常常向白種人要求平等待遇，惟要解決黃白之間的種族差別之前，應先將心比心，撤除長期恆互在黃種人（台人與日人）本身之間的差別，以免落入白種人拒絕之口實，而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虛假與偏頗，也語重心長地指出「物的統治是一時的，心的統治是永久的，不務永久而貪一時，吾們敢信斷不是日本帝國百年的大計」，<sup>40</sup>從而強調了「心服」比「力服」更為重要。

## 五、追求自治的渴望

輿論認為向來本國對於殖民地民族之間的統治關係，應如同家庭親子之間的恩愛關係一樣，絕不可以「主」與「僕」之間的榨取關係來看待，況且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方針，雖說採取「同化政策」，然而現行總督的官制組織，明明就是屬於特別統治的「自治主義」，這不啻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情形？因而台灣住民所追求的無非只是包括「政治自治」、「經濟自主」，以及「社會自由」在內的「真自治」，而非前述的「一視同仁」等務虛口號；此外，並沉痛指出「過去 25 年，3 百餘萬民眾，豈只口耳均不能發揮其效用，實則身心均無自由。從社會觀之，是無自營能力者；從國家觀之，則是完全的被治者；從人類觀之，則是極度的落伍者。如此不自然的畸形人，果真還能存於今日的新時代、新世界？」<sup>41</sup>換言之，台灣住民形同「非人」狀態的根源，仍在於追求「自治」之不可得，因此大聲疾呼民眾自己的權利、福利，必須由自己去主張而來實現，進而期勉台人「與其說自治是近代立憲政治的精華，毋寧說是民眾政治自覺的反映」，<sup>42</sup>無民眾政治自覺之處，實行自治亦無法收其實效。

---

<sup>39</sup> 「駁南報關於師範問題之暴論」，*台灣民報*，第 3 卷第 13 號（大正 14 年 5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211-212。

<sup>40</sup> 「有心人的一大急務」，*台灣民報*，第 100 號（大正 15 年 4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13。

<sup>41</sup> 「自治能力的養成」，*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2 號（大正 9 年 8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

<sup>42</sup> 「伊澤總督也要走了」，*台灣民報*，第 113 號（大正 15 年 7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40。

## 六、主張教育的平等

對於台灣住民而言，「教育」與「自治」可以說是同等重要，輿論也指出所謂的教育「是我等的教育，非他人的教育，是為民眾的教育，絕非為當局的教育」，<sup>43</sup>這樣便清楚地劃分出自我（台灣住民）／他者（殖民當局）之間的區隔。而台灣住民所需要的教育所指為何呢？輿論認為舉凡政治教育、人格教育、漢文教育、女子教育、勞工教育，以及補習教育等，只要能使個人得到完全發展的教育皆屬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先爭取教育上的自由平等，因為內、台人士若在教育上有了不平等的事實，則未來對於一般的社會生活上，也必定會產生千差萬別之待遇了，因而輿論在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的前提下，也極力反對增加島內內地學生，甚至是移入的內地日本學生之入校名額；最後輿論也惕勵著台灣同胞要自覺、要爭取，因為倘若「老者不能教，幼者無可學，雖是堂堂的黃帝子孫，也恐怕與蠻人無大異了」，<sup>44</sup>從此亦可見台灣住民追求自治、教育之決心與渴望了。

## 七、創造全新的自我

最後，輿論反覆地提出了建立「自我意識」、「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因為相信「人類鬥爭而呈現的諸民族間之不均衡，完全是在於各生活單位的素質薄弱。……吾人最極力提倡的是，為了和平要『完成自己』。並非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自我完成，必須是為了世界和平的自我充實。此誠整個今日世界最緊要的事，也是人類相互的根本欲求。故，明確地自覺於此，始不恥名為現代人，為此即使損己也不吝於助他，才是現代的新人」，<sup>45</sup>並且批判了昔日「移住富於天惠的台灣島之我輩漢族，習於三百餘年來物質的生活自由，結果遂完全忘卻追求現代人當然應享的精神自由，一直到最近幾乎不能脫卻其因襲的出稼根性」，進而呼籲「苟用心於於子孫幸福的有識者，必在島內做自救的最善努力，求依據於精神自由的新生活」，<sup>46</sup>而這也就是國父孫中心先生所謂的「革命必先革心」之理；此

---

<sup>43</sup> 「卷頭辭」，*台灣青年*，第3卷第2號（大正10年8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24。

<sup>44</sup> 「創刊詞」，*台灣民報*，第1號（大正12年4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72。

<sup>45</sup> 「卷頭辭」，*台灣青年*，第4卷第2號（大正11年2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33-34。

<sup>46</sup> 「台灣人的生存之道」，*台灣*，第4年第7號（大正12年7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63-64。

外，更期勉台灣住民「成為名符其實的台灣人」、「像個台灣人的台灣人」，<sup>47</sup>努力覺醒與培養實力，並且致力於遙遠未來、放眼廣大世界，必須不躊躇地前進，不猶豫地追求，追求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由，以及另一片新的光明天地。

此外，改為日刊版的《台灣新民報》則因為數量龐大與缺漏甚多，究竟在「皇民化」運動時期，對於日本「皇國／民」的想像上扮演何種輿論宣傳之角色，以及所能達到之效果，只有留待後續研究時再行探究了，而這也正是本文研究文獻的不足之處。不過，在此或許可以藉由 1938 年 9 月《台灣新民報》所刊載日籍監督者——編輯總務竹內清的一篇評論文章：「皇民化運動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而是始於 43 年前。……所謂『皇民化』就是『日本人化』，但是，本島人在 43 年前就成為日本人了，因此只說『要成為日本人』是不充分的，應該是『要成為忠良的日本人』，所以問題不但是本島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內地人未必是完成的日本人，同樣在新隸屬之民本島人當中未完成的人尚多，是當然之事」而先行一窺梗概。<sup>48</sup>以上文章中顯示了兩個值得注意之處：首先，時代的變化也使得作為「吾島民唯一的言論機關」之媒體輿論方向，不得向殖民者作適度的妥協；其次，如同尾崎秀樹所指出的一樣，倘若「皇民化」的藍圖從佔據台灣以來，早已由日本殖民者預先制定了，同時也能按照規劃促其實現內台同化的話，就無必要在盧溝橋事變後又如此大張旗鼓地推動「皇民化」，顯然實際情況恐怕距離「皇民化」的目標仍相當遙遠。<sup>49</sup>

### 第三節 台灣文學家的「皇國／民」想像

在日本殖民當局如火如荼地推動「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甚至偷襲珍珠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發動太平洋戰爭，並為補充大陸及南洋戰場上日益枯竭的兵源，強徵台灣志願兵遠赴戰場參戰之際，「皇民鍊成」被當作是運動的核心目標，與此同時，殖民者亦希望運動的核心價值、理念能夠逐漸擴展至各個年

---

<sup>47</sup> 參見「台灣的新使命」，*台灣*，第 3 年第 1 號（大正 11 年 4 月）；「實際運動與思想」，*台灣*，第 5 年第 1 號（大正 13 年 5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5、68。

<sup>48</sup> 「事變與台灣人」，*台灣新民報*，1939 年 12 月。

<sup>49</sup>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等譯，「決戰下的台灣文學」，*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 年），頁 182。

齡層，尤其是三十多歲的知識人、文化人階層，<sup>50</sup>在這種決戰、高壓的恫嚇環境下，台灣的知識人、文化人階層被壓制、分化，甚至崩解了，例如在文學家方面，如同鍾肇政所言，雖然也有繼續堅持民族立場，產生「自覺」、「命令不能」型的台人作家，然而亦曾出現了「盲目」、「屈從」於日本殖民者的台人文學家。這些不同類型的文學家，論者大多將周金波、陳火泉、王昶雄、楊達、吳濁流等人，視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sup>51</sup>而他們對於「皇國」、「皇民」、「皇民鍊成」，或是「如何成為日本人」等等的不同書寫文本、敘事，<sup>52</sup>構成了對於「皇民」、「日本」或「日本人」這個「他者」的不同想像。本章所賴以分析的台灣文學家之作品篇章、發表時間及地點，如表 4-2。

表 4-2 本章有關的台灣文學家作品篇章、發表時間及地點

姓名	生卒年	作品篇章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周金波	1920-1996	〈水癘〉、〈志願兵〉、〈關於徵兵制〉、〈皇民文學之樹立〉、〈灣生與灣製〉〈我走過的道路：文學、戲劇、電影〉、〈談我的文學〉	1941-1993	陸續發表於《文藝台灣》、《文學報國》、《文學台灣》、《野草》等雜誌
王昶雄	1916-2000	《奔流》	1943	《台灣文學》雜誌
陳火泉	1908-1999	〈道〉、〈我能做些什麼？〉	1943-1984	《文藝台灣》雜誌、《自立晚報》
吳濁流	1900-1976	〈水月〉、〈先生媽〉、〈陳大人〉、《亞細亞的孤兒》	1936-1945	陸續發表於《台灣新文學》、《新新雜誌》等雜誌、《民

<sup>50</sup> 周金波，「關於志願兵」，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237-238。

<sup>51</sup> 按照這樣的分類，所謂「盲目型」為民族意識非常稀薄到極近已消滅的作家，並且相信日本人的宣傳，讚賞皇國、皇軍及「大東亞聖戰」；「屈從型」為身為小說家，同時是有成果的作家們，但要先為總督府所考量的對象，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被派遣到各地發表見聞者，換言之，台灣人作家大多屬於這一類；「自覺型」為置身於險境中也不忘民族立場，而以楊達為典型的代表作家；「命令不能型」特別是指吳濁流，參見中島利郎，「『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326。而關於「皇民作家」較為簡潔的認定標準，台灣文學耆老葉石濤言簡意賅地認為是「理念上認同殖民政府政策、走向親日路線」者，參見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年），頁66。此外，由於楊達的文學作品，較少直接涉及本文主題——關於「成為日本人」的想像與認知，因此本章在此略而不論。

<sup>52</sup> 根據日本橫濱大學副教授垂水千惠的研究，日據時期30、40年代台灣作家的書寫文本中，有關台灣人自我認同意識的探討，其問題形式相當單純，即是「台灣人如何成為日本人」的主題，參見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頁31。

## 一、周金波的「皇國 / 民」想像

周金波，1920 年生，基隆市人，強裸時期被母親帶往日本依親，與父親同住，畢業於日本大學附屬第三中學、日本大學齒科部，其大學時代曾參加「文學座」戲劇演出，返台後雖繼承父志，執業「長壽齒科醫院」，惟仍筆耕不輟，陸續發表了許多小說、隨筆、劇本、短歌等文學著作。1941 年 3 月周金波返台，時值中日戰爭愈演愈熾，作為「皇民化」運動最高潮的表徵——「志願兵」制度的政策像場鬧劇般熱鬧登場了，因其陸續寫就的文章摻雜了濃厚歌頌「皇民化」運動之情而極具爭議性，除了日本人之外，亦被多數台灣人貼上「皇民作家」的標籤，相關貶抑的評論未曾間斷，同樣地，其蘊含「皇民」觀點的〈水癌〉、〈志願兵〉、〈關於徵兵制〉、〈皇民文學之樹立〉、〈無話說的內台合一〉等重要著作，亦多被視為「皇民文學」的代表，其中〈志願兵〉一文更曾於 1942 年 6 月獲得「文藝台灣賞」，周金波並因此於隔年 8 月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前往日本東京參加第 2 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可以說將其在日據時期的文學事業推上了新的高峰。

### (一) 〈水癌〉：

發表於《文藝台灣》第 2 卷第 1 期的〈水癌〉，是周金波於返台前夕完成的，小說的靈感泉源來自於其返台省親時，對所見不顧罹患水癌重病的女兒，而依舊沉迷賭博的母親之怨氣，由此鋪陳了整個故事架構。故事的主人翁「他」是留學日本後返台開業的台灣牙科醫生，面對上述情形，矢志要教化島民，因為「那種女人身上所流的血，也是流在我身體中的血。不應該坐視，我的血也要洗乾淨」，因而期許自己不只要做「普通的醫生」，更重要的是必須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sup>53</sup>事實上，小說敘事中的這個「他」活脫就是周金波本尊的再現。在文本中周金波將屬於「庶民階層」、「沒有教養」的母親，象徵著奢侈、無知、低劣，以及道德、精神水準有待提升的故鄉台灣，並將「榻榻米上的生活」、「日本婦道的母愛」、「關心孩子生死命運的牙醫」，視為高雅、品味，以及道德水準發達的日本文化。而「他」在面對故鄉台灣的沉疴醫治，雖一度有過高估台灣的不切實際想法，但在「皇民鍊成」運動加速進行，並將自信心強有力地迅速推上去之際，「他」最

<sup>53</sup> 周金波，「水癌」，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12。

終相信「島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可以比所預想的更容易，更迅速地辦到」。<sup>54</sup>

〈水癩〉時期的周金波，如同日本盛德學園大學教授中島利郎所言，充滿了年輕生命的理想性色彩，而且因為在知識、生活樣式上完全繼承了日本式近代精神重要特質的「合理主義」，並以此種日本眼光凝視台灣時，總體上，反映出比日本還落後的圖景，因此在他觀念意識中的「皇民鍊成」運動，也僅限於「焚燒迷信」、「打破陋習」的必要而已，<sup>55</sup>如果說這些還屬於初級的、低層次的社會意識問題的話，那麼 6 個月之後，發表於《文藝台灣》第 2 卷第 6 期的〈志願兵〉，則進一步將問題引申至更高層次的認同與精神層面之問題。

## (二) 〈志願兵〉與〈關於徵兵制〉：

受西川滿指示下所寫出的〈志願兵〉一文，<sup>56</sup>其故事的主人翁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我」、「我」的義弟「張明貴」，以及在日本人食品店工作，並藉此學得一口流利日語的「高進六」3 人。故事從「我」前往基隆港迎接遠自「先進」的內地日本留學，因為好奇與興奮殖民當局推動「改姓名」與「志願兵制度」，而興起返台探親念頭的「明貴」說起，只是深受日本教化的他因為期望過高，抵台後洩氣地認為台灣現狀仍是「舊態依然」，而他所指涉的「進步」判準也並非「進六」強調的台灣建築物、廣場等物質、硬體設施環境之改善，而主要是精神層面的革新，例如工人、小孩仍毫不在乎地穿越白衣軍人的面前，<sup>57</sup>這在「軍隊如同天皇的手足」之內地日本是絕對不會出現的大不敬行為，諷刺的是，「明貴」這些敏感而神經質的轉變，對於同樣留學過日本、同樣曾對日本生活價值高度推崇，甚至返台初期自認比他抱持更大抱負、更高熱情想把台灣迷信、陋習之「老殼」打破的「我」，坦承仍是「屬於無法完全理解的領域」。<sup>58</sup>

而故事的主要焦點，環繞在「明貴」與「進六」雖然彼此對於「成為日本人」並無異議，但對「如何」成為日本人的問題，卻產生了方法論上的爭議。對此，「進六」因為參加了「報國青年隊」，選擇了依靠「神明的力量」，面對「明貴」質疑青年隊隊部所使用的「拍掌（kashiwade）儀式」與「皇民鍊成」運動之間的關係時，他解釋：「拍掌時，神明會引導我們向神明接近，向至誠神明祈禱就是達到神人一致的境界，古代的祭祀就是這種神人一致的理念，祭典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政教一致就是皇道政治的根源，…從拍掌儀式而能接觸大和精神…，這

<sup>54</sup> 周金波，「水癩」，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4。

<sup>55</sup> 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5。

<sup>56</sup> 垂水千惠，「台灣作家的認同意識和日本：周金波的近代觀點」，頁 51。

<sup>57</sup> 周金波，「志願兵」，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0。

<sup>58</sup> 周金波，「志願兵」，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4-25。

種體驗是過去台灣青年很少有人領會到的。經過拍掌的形式產生一種信念，就是這種信念的問題，這種能成為堂堂正正日本人的信念」。<sup>59</sup>只是「明貴」非但不贊同「進六」上述的偏狹想法，還從「環境論」的觀點出發，認為仍處於低水準程度的台灣人，應先從文化、生活等面向著手，將當下的「皇民鍊成」視為緊要，加以教養與訓練，如此才能將水準拉到和日本內地一樣，接著他又反駁「進六」對於「日本精神」的看法，認為：「日本精神的注入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靠神明的力量。提起日本人，像你我一樣受過日本教育的人誰也能成為日本人……，成為日本人有那麼困難嗎？我一點也不覺得。在皇居的二重橋前能感受到嚴肅的叩頭那種感激就夠了，到靖國神社參拜叩頭時，那種說不出的感激能體會出來就足夠是日本人」。<sup>60</sup>

然而，秉持日本式近代合理主義、科學精神色彩的「明貴」，雖然自我設定了「如何」成為日本人的問題，卻對「為何」成為日本人的問題，觀念意識中仍不免含有濃厚的「宿命論」(fatalism)氣息，他解釋：「為什麼不做日本人不行的原因，這是我首先必須考慮的，我在日本的領土出生，我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日本話以外不會說，我假如不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所以我必須成為日本人以外沒有辦法」，<sup>61</sup>而這種「宿命論」的形成，也被視為是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脆弱性，以及為了改變「自我」的認同而痛苦掙扎地存在而已；<sup>62</sup>反觀，看似依靠「神明的力量」的「進六」，對「如何」成為日本人，卻發揮了非理性的「意志論」(voluntarism)精神，立下了「血書志願」而當下立即成為「皇軍(志願兵)=日本人」的一員，相對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進六」這個庶民階級展現了的莫大能量，不但跨越了與內地日本人之間的藩籬，更超越了與本島台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差距，<sup>63</sup>與此同時，也體現了另一種「神人一致」的新境界。

事實上，〈志願兵〉裡面「明貴」與「進六」的2個角色，在一場「關於徵兵制」的座談會中，依照周金波個人的說法，確實反映了當時本島人的2個不同想法：一是「精打細算型」的想法(例如「明貴」)；二是「沒有理論型」，自稱是日本人(例如「進六」)。而〈志願兵〉的主題正是探討何者才會正確地活在這個時代？而在故事中最接近實際的周金波之人，也許是屬於「精打細算型」的「明貴」，惟他個人則選擇相信「沒有理論型」才能肩負台灣的將來，<sup>64</sup>如同故事中的「明貴」對「我」所表示「去向進六道歉了，輸給他了，進六才是為台灣

<sup>59</sup> 周金波，「志願兵」，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27-28、31。

<sup>60</sup> 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8、11。

<sup>61</sup> 周金波，「志願兵」，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33。

<sup>62</sup> 垂水千惠，「台灣作家的認同意識和日本：周金波的近代觀點」，頁57。

<sup>63</sup> 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10-11。

<sup>64</sup> 「關於徵兵制」，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236-237。

而推動台灣的人材，我還是無力的，無法為台灣做什麼事，腦筋太硬板了」的一樣。<sup>65</sup>可以說，從宣布實施志願兵制度，到以「血書志願」的方式參加志願兵，帶給長期苦惱於想做日本人卻不能完全成為日本人的周金波而言，澈悟到通過「精神發揚」的強烈要求，而開啓了一條既能克服自我認同的矛盾，又能避免日人差別待遇與侮辱的新捷徑。

### (三) 〈皇民文學之樹立〉：

對於殖民政府所積極推動的「皇民文學」，周金波曾於 1943 年 8 月前往日本東京參加的第 2 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附和地發表了一篇〈皇民文學之樹立〉的感言，他指出「大和民族」、「漢民族」與「高砂族」的三位一體，為達成聖戰而協力向前邁進，並且描寫在殘酷決戰體制下的整個台灣之真正面貌，<sup>66</sup>來確立成為所謂「大東亞文化共榮圈」的一分子，在此之下，探討「台灣文學」或「皇民文學」才有意義上的可能。換言之，他認為對於「皇民文學」的定義，應該是「描述存在於民族間精神的燃燒，從這裡找出解決之道的文學」。<sup>67</sup>倘若以此標準觀之，他認為陳火泉走向皇民之路的〈道〉、王昶雄在所處嚴峻時潮中，描寫欲成為真正天皇國民的兩個不同世代形象之〈奔流〉，以及庄司總一正面針對民族血統問題加以評論的《陳夫人》等作品，都可算是台灣文學界前所未見的一個「飛躍」，也從而印證了作為「皇民」的一個堅決不搖的自信。<sup>68</sup>只是，真正的民族問題之解決，或所謂的「內台融合」，並非僅是依靠幾篇「皇民文學」的文本作品就能達成的，必須是立於各民族一律「平等」、「存在」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的，實際上這與「皇民化」運動所要揭櫫的目標——將台灣人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忠誠帝國的子民」，根本就是背道而馳的，既然民族都不存在了，更何來「平等」之說？

綜上所述，周金波的〈志願兵〉使他成為第一次正面呼應日本殖民帝國戰時體制的台灣作家，而其後來的文學作品，乃至個人的精神狀態，無疑地亦受殖民當局宣布實施的「志願兵制度」影響很大，此即他坦承由於長年在日本的生活經驗，反倒使他與故鄉台灣的人、事、物等方面「格格不入」，一直到宣布的這天（1941 年 6 月 20 日）才獲得解脫，他在日記上這樣寫道：「這一天，我特別感到充滿自信的喜悅，彷彿可以從漫長孤獨的殼中掙脫出來」，而究其原因完全是

<sup>65</sup> 周金波，「志願兵」，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35。

<sup>66</sup> 「皇民文學之樹立」，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31。

<sup>67</sup> 「關於徵兵制」，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35。

<sup>68</sup> 「皇民文學之樹立」，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31-232。

此一制度的宣布，因而使他自認與週遭群體之間有了「共同的語言」，致使情況為之一變，而「坦然相對地『緊密』在一起了，同樣是來自於精神發揚的強烈要求，使這「緊密」結合成了可能」。<sup>69</sup>而他與其他台灣住民之所以「精神為之一振」，難道不也是因為長期遭到殖民當局的壓抑、歧視，咸認「我們之所以被歧視，是因為我們沒有流血。若有流血犧牲，就可以說大話，要求實踐義務。每個人都認清這個事實」<sup>70</sup>的這種直覺而產生的嗎？在這種直覺之下，他在文學作品中鼓吹台人為完全地「成為日本人」，必須志願從軍，向天皇繳交「血稅」……，而這類似的故事情節，日後也成為許多「皇民文學」文本中「共同的語言」了。

## 二、王昶雄的「皇國 / 民」想像

王昶雄，1916年生，台北淡水鎮人，其成長背景類似周金波，同樣是公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留學，先後畢業於郁文館中學、日本大學齒科部，返台後也如同周金波般開業齒科診所，同時也繼續日本留學期間的文學創作之路。其著有許多小說、散文、詩、評論等作品，散見於《台灣文學》、《文藝台灣》、《台灣日日新報》等刊物上，而重要的代表作包括〈淡水河之漣漪〉、〈奔流〉、〈梨園之歌〉、〈鏡〉等，其中曾收入於1943年《台灣小說集》的〈奔流〉一文，更曾圍繞在是否為「皇民文學」的問題，引起了褒貶不一的評價。<sup>71</sup>而〈奔流〉也成稿於「皇民化」最為熾烈的1942年仲秋，但直到1943年7月，在幾經總督府保安課的多方刁難與竄改下，才獲准刊載於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雜誌上，<sup>72</sup>同時，也就是因為這幾段遭到「刁難與竄改」的文字部分，才成為最引人激烈評論的地方。

73

<sup>69</sup> 周金波，「我走過的道路：文學、戲劇、電影」，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280-281。

<sup>70</sup> 周金波，「談我的文學」，*文學台灣*，第23期（1997年7月5日），頁233。

<sup>71</sup> 對於這篇小說，有論者認為是一篇皇民化作品，但也有論者認為是一篇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傾訴皇民化苦悶心聲的寫實小說。參見張恆豪，「世界觀的激盪——王昶雄集序」，張恆豪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年），頁321。

<sup>72</sup> 張恆豪，「反殖民的浪花——王昶雄及其代表作『奔流』」，張恆豪編，前引書，頁366。

<sup>73</sup> 坊間關於「奔流」的中譯本大致可見兩種版本，即「許俊雅版」與「張恆豪版」，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內容敘述上鼓吹「皇民」意識的多與寡，「許俊雅版」的譯本似乎較為完整，而「張恆豪版」則認為那些感覺「突兀」的文字，都是「日本官憲的偷天換日，有些尖銳的地方被刪去，而有些地方被硬生生的補充」，因此在台灣回歸中國後，為王昶雄改正而刪除不用。據筆者統計，這兩種版本不一致的地方約有20處，為求本文焦點在於探討台、日人對「皇民」的想像，這些刪除的部分，無論原本就是王昶雄的本意，或是後來日本官憲威逼添加的，都可作為探討的重要內容，因此在此仍採用「許俊雅版」的譯本。參見許俊雅編，*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年）；張恆豪編，前引書。

〈奔流〉的主人翁為不知其名的醫生「我」、日語教師的「朱春生」（後改日本姓名為「伊東春生」），以及「伊東」的表弟「林柏年」等3人。王昶雄透過在母子、師生之間，對於「本島我」與「皇民我」盤根錯節般的理念、情感與糾纏，以一個醫生特殊分析的凝視眼光，除了檢證了自身「我」的心理鬱結因素外，也呈現出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中的掙扎、苦悶與徬徨。

在文本中，從日本留學返台的「伊東」，在「皇民化」運動下，不但以日籍丈母娘為母親，而且數典忘祖，與原來的生父母家庭決裂，不顧他們的病痛死活，且致力於去除故鄉鄉間的「土臭味」，可以說，其言行舉止已完全「日本化」，充分表現出一個「皇民我」的態樣，也因此他不但認為本島青年「沒有懷抱太大的夢，直接了當地說，殖民地的劣根性經常低迷不散」，並認定其中的根源就在於「無法離開自我的世界」，<sup>74</sup>這裡他所不屑的「自我」，正是指涉尚未進入「皇民我」之前的「本島我」，而這種「本島我」在他的眼中，正是視野狹窄，更遑論氣節、氣概了，因此非得重新改造學習不可。而「柏年」則成為與「伊東」截然對比的另一端，面對其表兄的不顧親情，數典忘祖的不齒行徑，他所代表的正是剛毅不拔、純真正義，雖然不以「成為日本人」為恥，但更以自己故鄉血液為榮的台灣青年，因此他拼命地想打垮像「伊東」那種「身為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人的傢伙」，<sup>75</sup>而這樣的體認，在他前往日本學習劍道之後，獲得了更深一層的認知：「我愈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愈非是個堂堂的台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南方，就鄙夷自己。沁入這裡的生活，並不一定要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不論母親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對我仍然有著無限的依戀。即使母親以那難看的外表到這裡來，我也不會有絲毫的畏縮。只要被母親擁在懷裡，是喜是悲，就像幼兒一般，一切任其自然」。<sup>76</sup>

「伊東」與「柏年」這2位小說人物，同樣地選擇了前往殖民母國留學，也同樣地違背了家人對他們進入醫學校深造的期待：前者選擇進入大學的國文（日文）系就讀；而後者則是進入武道專門學校學習劍道。儘管動機與目的有所不同，但兩人都不約而同，選擇了最能展現「日本精神」的「文」、「武」內涵之象徵——「日語」與「劍道」。日本殖民者向來視「日語」為「日本人精神上的血液」，聽說讀寫，甚至教學日語，不但可以涵養日本精神、認識日本國家個性、體會日本國體精髓，從而使得台灣人具備日本人的性格，求得台灣人的最大幸福，這可以看作是屬於「日本精神」之「文」的一面；而「劍道」所使用的刀劍，從古代即是作為日本帝位象徵的3種神器（玉璽、寶鏡、寶劍）之1，如同祈禱、祭祀、

<sup>74</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358。

<sup>75</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379。

<sup>76</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389。

神祐等象徵性的效用般，<sup>77</sup>同時，劍道精神也代表著不怕死、負責任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中世紀以後被武士階層徹底發揚光大後，廣泛地為其他社會階層人士所接受，成為實際上日本精神的代表之一，這可以看作是屬於「日本精神」之「武」的一面。這在受到當時日本殖民帝國的影響，以及面對日本對世界局勢的重要意義來說，兩人嘗試以「原汁原味」的方式，來瞭解與學習日本的文明精神與哲學遺產，也是可以想像的，但回過頭來，仔細推敲兩人個別選擇的動機與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希望能得到與日本人毫無二致的平等，而差異點在於，「伊東」似乎以口說、教授流利，甚至比內地日本人還道地的日語，完全地沁入日本人的生活，來與「本島人」區隔開來，並且也以作為一個「皇民我」為己任；而「柏年」則雖全力將原本屬於日本「國技」的劍道，變成自己的東西，企圖用身體、鮮血來連繫所謂的「大和魂」，但打從心底卻未曾鄙夷過自己的南方故鄉，依然懷抱著「本島我」的赤子之心。

至於那位不知其名的醫生「我」呢？他原先也像「伊東」般，以沁入日本人的生活為榮，舉凡日本的插花、茶道、劍道、衣著、居所，甚至是日本的「冬陽」，在「我」的眼光或記憶中無一不美、無一不好，他這麼形容在內地期間的生活：「我在內地所過的 10 年生活，決不是全都愉快的回憶，但我發現了真正的日本美……，體驗到把我那接觸到比憧憬更高更高的理想的精神，從根抵搖撼的事情，就是在這期間。自己不能甘於出生於南方的一個日本人，而非成為純粹的日本人，心便不能安。並不是自動地努力於內地化，而是在無意識中，內地人的血，移注於自己的血管內，在不知不覺中，已靜靜地在流動般的那樣的心情」，<sup>78</sup>同時，也正是由於不甘於自己「不純」的血統，因此每當在日本內地碰到別人問起籍貫時，他總是會有這樣「本能性」的直接反應：「不知是什麼心理作用，大抵回答四國或九州。為什麼我有顧忌，不敢說是『台灣』呢？因此我不得不經常頂著木村文六的假名做事情。到浴堂去，到飯店去喝酒，都使用這名字。自以為是個頗為道地的內地人，得意地聳著肩膀高談闊論。有時胡亂賣弄一些江戶土腔，把對方唬得一愣一愣的。因此，跟台灣土腔很重的友人在一起時，怕被認出是台灣人，為之提心吊膽。當假面皮就要被揭開時，我就會像松鼠一般逃之夭夭。10 年間，不間斷的，我的精神都在緊張狀態下」，<sup>79</sup>而類似這種「本能性」的反應，亦出現於周金波所說在東京見到「灣生」（在台灣出生的內地日本人）時產生的「警戒信號」般，是一種深怕「吹破牛皮」的防衛心理，同時，無可避免地從中也摻雜著些許不安、猶豫、屈卑的心態作祟。<sup>80</sup>

<sup>77</sup> 「劍道的歷史」，<http://www.dyu.edu.tw/~clubg4/paper/kendo/what/star.htm>。

<sup>78</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63。

<sup>79</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73-374。

<sup>80</sup> 周金波，「灣生與灣製」及「我走過的道路：文學、戲劇、電影」，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

當然，「我」畢竟還不同於面對親友的任何批評、詆毀，仍能泰然自若的「伊東」，因此「我」對自己鄙夷故鄉台灣的言行醜態，內心不時有種天人交戰的糾纏，因此只有不斷地給予「合理化」自己行為的理由，他不但一方面強調「台灣人決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愛斯基摩人。不僅如此，和內地出生的人，沒有任何不同。要有榮譽感！要有同是日本臣民的榮譽感啊」，同時，另一方面也認定「我死勁地隱藏自己的本性，豈不是對那常賜給我溫牀的母鳥慈愛的翅膀的一種渴求嗎？那種心情，換句話說，並不是被強迫才這樣努力的，是一種憧憬的心，在不知不覺間，使我浸染於那種生活，精神的。我是在渴求，是對宏大的慈愛的迹近貪婪的渴求」。<sup>81</sup>照理說，「我」如此積極從事自我心理的調適，對於「伊東」崇日媚外的舉措，應該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只是面對與「伊東」強烈不同，又代表「純真」的對照組——「柏年」出現在眼前之後，「我」有如提壺灌頂般，幡然覺悟了，自責以往種種行為只因心裡烙印著「內地冬晴的驚人的美妙」，竟遺忘了「故鄉常夏的好」，<sup>82</sup>在「我」痛感自己對鄉土的愛心不夠之瞬間，「我」也重新找到，並且回歸了原來的「自我」。

綜上所述，〈奔流〉不只是「我」對「自我」的內心剖析，更牽涉到對整個日本殖民體制壓迫問題的深層無奈，於是像「伊東」、「柏年」般千千萬萬的被殖民者，因在家庭、學校，乃至社會上，頻頻遭到小至語言、學習、風俗、習慣、生活，大至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的雙重「準繩」牽引、羈絆、拋棄與認同，最終造成人格、思想、精神上的分裂苦楚，而深深徘徊在「本島我」與「皇民我」的糾纏之間，末了，「我」將充塞於內心的不滿情緒，奮力地逆風疾跑，跌倒了爬起來再跑，象徵著向這個壓抑、苦悶的時代表達最深層的抗議。

### 三、陳火泉的「皇國 / 民」想像

陳火泉，1908年生，台灣彰化人，其求學過程都在台灣，先後畢業於鹿港第二公學校、第一公學校高等科、台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並旋即由母校推派進入「台灣製腦株式會社」工作，從此以後，一直到台灣光復後的70年代，都

---

引書，頁194-195、297。此外，垂水千惠亦曾以文化人類學中的“passing”（「變身」或「越境潛入」之意）來解釋「我」的心理，具體的說就是「個人離開了自己所屬的民族集團，潛入多數民族的集團之中，隱姓埋名，希望完全成為他們一員」的心理，參見垂水千惠，「多文化主義的萌芽：王昶雄的例子」，前引書，頁101。

<sup>81</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374。

<sup>82</sup>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391。

與樟腦工業留下不解之緣，甚至在日據時期更會因為發明蒸餾樟腦的「火旋式灶」，而在全日本產業技術戰士彰顯大會上，獲頒「顯彰狀」、「顯功章」等殊榮。就文學創作而言，在日據時期，他於1943年7月因西川滿與濱田隼雄的推薦，得以在《文藝台灣》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小說〈道〉，並獲得日本芥川獎候補之殊榮，陸續所發表的小說中，〈道〉與〈張先生〉更被殖民當局收錄為「皇民叢書」之一，因而成為「皇民文學」的代表。同樣地，像是對鑽研樟腦製程的狂熱般，文學也成為他另一個終身發展的志業，而且直到逝世前，可謂筆耕不輟，稱的上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光復後亦曾獲得「國家文藝創作特殊貢獻獎」，其中〈悠悠人生路〉、〈青春之泉〉、〈個的發揮〉、〈人生長短調〉、〈活在快樂中〉、〈人生長短調〉等人生6書，為許多學校採用為課外讀物，也被台北市政府推薦為優良圖書。因此可以說，無論在日據時期或光復後，陳火泉所撰寫的小說敘事，無論是主觀意識或客觀作為上，都帶有點「勵志文學」的性質，而且都成為兩個時期執政當局希望鼓勵或當作那時無數在人生旅途中徬徨的年輕人，重新尋找奮鬥方向的座標，甚至是「御用的工具」，這樣的情況，在日據時期更是表現明顯，因而所引發的評價論戰也相當兩極化。<sup>83</sup>

〈道〉的主人翁「他」，俳號「青楠」，是一個「台灣製腦株式會社」的僱員，儘管就促進樟腦產業升級方面，「青楠」有著突破性的特殊發明貢獻，然而卻只能眼見日本同僚們一個個陞官、住進寬敞的官舍、領有津貼的補助，相形之下，像他這樣的「本島人」僱員卻只能生活在赤貧線邊緣，至多勉強求得溫飽而已，更遑論像樣的宿舍了。如此的遭遇，卻相當吻合陳火泉的個人生平事蹟，甚至可以這麼說，〈道〉實際上就是其本人的自傳性小說，<sup>84</sup>對此，他本人也毫不隱瞞地證實說：「廣田主任給我一個當頭棒喝：『毫不客氣的說，本島人不是人啊！』這使我悟出了掙出樊籠的道理，終於激使我在當天晚上立刻握起筆來，著手寫小說〈道〉」，<sup>85</sup>而這句內地日本人對「本島人不是人」的「裁決」，對陳火泉造成的傷害，何只是喪失了陞遷機會，繼續墜入物質層面的匱乏境地，而失去了「翻身」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所造成的斬傷，讓「青楠」／陳火泉進一步思索如何去「迎合」殖民者所認可的「人」的標準，探問成為「皇民」、「日本人」的方式，而正是這一部分的「皇民」想像，也是最引起論者正、反評價之處。

<sup>83</sup> 有關陳火泉及其小說〈道〉的兩極評價，主要仍然圍繞在是否為「皇民文學」的認定上，有論者認為〈道〉是描寫當時台灣人被迫作為皇民的痛苦、矛盾與衝突的著作，如陳少廷、鍾肇政等人；也有論者認為〈道〉是為了把自己改造成為日本人，而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主體，如陳映真等人。參見垂水千惠，「日本統治與皇民文學：陳火泉的例子」，前引書，頁75；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判」，*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1998年），頁12。

<sup>84</sup> 垂水千惠，「日本統治與皇民文學：陳火泉的例子」，前引書，頁85-6。

<sup>85</sup> 陳火泉，「我能做些什麼？」，*自立晚報*，1984年5月24日，副刊。

儘管在認知上，「青楠」認為自己已是個「卓越的日本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卻因屢次遭到日本人的挑釁、欺凌與毆打，推論原因應是自己的「日本人」身分，並未得到其他「真正」日本人的認可，因此他另謀以「精神系圖」的論證，<sup>86</sup>來企圖合理化「血緣種族」的不同，以及稼接其「日本人」身分，因而經其「體會」後發展出一套「精神的日本人」論證：「所謂『日本精神』，我不願意把日本精神解釋為日本人所具有的精神。在這場合，我把日本界說為天生的日本人，更簡單地說，就是限定為「內地人」——在天生的日本人之中，的確也有把日本精神擱置在母胎中忘記帶來的。從大局著眼，這個日本精神是所有天生的日本人應有的本的氣質，但遺憾的是常常見到缺少這種精神的人。不客氣地說，的確令人覺得『這也是日本人嗎？』像這樣的日本人也存在著。……還有，有些人把非天生的日本人——也就是本島人——澈底地認定他們是本島人，認為他們絕對不懂日本精神，而事事氣勢洶洶地擺出架勢，完全給人以日本精神專利者的感覺。可是，我想日本精神絕不是那麼偏狹的東西。……日本精神是什麼？據我瞭解，一句話，就是尊王攘夷的精神。『一旦有事，為君捐軀，是以此身，豈可虛度？』這就是尊王攘夷的精神。……討夷、攘夷，而且非清除夷狄不罷休，…這種為當代天皇攘夷，洗淨夷狄之心的精神，這就是日本精神…。所以說，具有尊王攘夷的精神的人才是日本精神的所有人。在本島人之中，朝鮮人之中，還有在滿洲人之中，的確具有這種精神的人。縱然那不是與生俱來的，但把它抱得緊緊的人還是應該有的」。<sup>87</sup>

「青楠」甚至還援引歷史上豐臣秀吉攻打朝鮮、倭寇侵犯明朝海疆，擄獲許多朝鮮人及支那人返回日本，經過歸化後，超越血液，由歷史鍊成「日本人」而再造中興的最好例證，來證明他的論述之合理性。只是「青楠」這樣苦心經營與建構「精神的日本人」技倆，在面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利益衝突時，便完全地被殖民者以一句「天生的日本人」、「血統的日本人」的「血統論」所輕易解構了，更有甚者的是，在殖民者的眼光中，「本島人」都不夠格成為「人」，更遑論「成為日本人」了。當然，就殖民者的立場而言，也多少有些考量「青楠」的論點，可能會危及日本人在台灣及「本島人」之上的優越地位，因而必須予以推翻，因此一向被「青楠」視為已「超越主從關係的父子情」的「廣田」股長，當面潑了他一盆冷水：「體會的真實性，未必意味著認識的正當合理性」，<sup>88</sup>換言之，沒有「血緣」關係的「近似的」日本人，畢竟仍不等同於「真正的」日本人，他不禁只有感嘆並寄情詩語：「菊是菊。花是櫻。牡丹終究不是花是！能大呼天皇

<sup>86</sup> 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份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1/3-c-2.htm#sec3>。

<sup>87</sup> 陳火泉，「道」，[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TaiwanLit/online\\_papers/ref1.html](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TaiwanLit/online_papers/ref1.html)。

<sup>88</sup> 陳火泉，「道」。

陛下萬歲而死的只有皇軍，貢獻一身殉國的只有皇國臣民，我等島人畢竟不是皇民嗎？啊，終究不是人嗎？」。<sup>89</sup>

由於缺乏「血緣」關係，「青楠」到最後只得借助參加「志願兵」的行列，來向「天生的日本人」繳交「血稅」，藉此獲得血緣的「融合」，以求得日本人的認同，他在「2月2日為志願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而作」的詩中這麼說：「雖然自以為日本國的這個軀體裏，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呀！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當勇敢赴死於沙場！既決意捨身則無欲望，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sup>90</sup>

綜上所述，「青楠」的心路歷程相當一部分反映了陳火泉當時的精神狀態，儘管他一如周金波般鼓吹台人志願從軍，最終亦選擇成為「皇民」，<sup>91</sup>然而，像「青楠」一樣，他必須，也應該覺悟，殖民者所說的「一視同仁」終究不過是句口號，它無法掩飾「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的不同，倘若要超越現實中的差別待遇，就必須邁向「皇民之道」，只是以前種種的思索方式，如什麼「應與日本民族傳承同一的生活型態」啦、什麼「日本精神」啦、什麼「國語思考」啦等等全都不頂用，「本島人」能否成為「皇民」，就在於「非朝著同一目標，對同一敵人，本島人與內地人一起流汗，一起流血」，換言之，其關鍵就是「死」這麼一回事，亦即「生與死兩者之間擇其一，就是速速安頓死這方面而已」，<sup>92</sup>諷刺的是，日本殖民台灣近50年的當時，也只有在死神面前，無論是「本島人」或「內地人」、「台灣人」或「日本人」，人人才能「一視同仁」、「內台合一」，生不能成為「日本人」，死可選擇成為「日本鬼」。如此而言，這是「青楠」，也是陳火泉選擇成為「皇民」的心理最大諷刺之處。

#### 四、吳濁流的「皇國 / 民」想像

吳濁流，1900年生，新竹新埔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公學校教師

<sup>89</sup> 陳火泉，「道」。

<sup>90</sup> 陳火泉，「道」。

<sup>91</sup> 陳火泉本人在前述「關於徵兵制」的座談會上這麼說：「開始實施徵兵制度時，就已經等待這一天的到來，果然有新的感動，知道這件事時，有從此之後非要作得更實在不可之感」、「日本的軍隊如同天皇的手足，被選上的軍隊要把尊皇攘夷當作思想中心，這是3千年之間被教導訓練而成的傳統，因此大家每人都能大叫著天皇萬歲而死。……要650萬融成一體地去反省不可，首先一定要在精神上坦誠地享受尊皇攘夷的精神…不把這精神以身體力行不是就沒法追得上時勢嗎？」，參見「關於徵兵制」，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237。

<sup>92</sup> 陳火泉，「道」。

達 20 年之久，因受同事激勵，由漢詩寫作開始投入小說創作。嗣後，因抗議日本督學公然侮辱台灣教員，憤而辭職，並於 1941 年前往大陸南京，出任《大陸新報》記者，未幾返台，發表〈南京雜感〉，並開始撰寫其最重要的代表作——長篇小說《胡太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亞細亞的孤兒」一詞一度成為台灣人心靈的真實寫照，戰後更傾其積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影響台灣現代文學發展相當深遠。吳濁流亦屬難能可貴的多產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尚有〈水月〉、〈先生媽〉、〈陳大人〉、《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短篇小說 10 餘篇。

### （一）〈水月〉與〈先生媽〉：

〈水月〉為吳濁流系列小說的處女作，發表的時間正是日本殖民政府著手推動「皇民化」運動之際。〈水月〉的主人翁是台灣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知識分子「仁吉」，隨著同等學歷，甚至年資較淺的會社日本同事陸續升職，待遇津貼及福利，又較本島人為高，生活安定，衣食無缺，兩相對照之下，不禁徒負呼呼。因此只有寄情於年輕時期所懷抱赴日留學，追求更好生活的夢想了，只是這樣的美麗蕩漾的夢想，在現實生活的千斤重擔壓力之下，也只能如同水中之月般，依稀看得到，卻永遠也搆不著。〈水月〉基本上戳破了殖民者「內台合一」、「一視同仁」宣傳口號的謊言，無疑地是對向現實低頭，以求榮華富貴的知識分子，甚至少數暫獲寵信「御用士紳」的當頭棒喝，只是這樣的「棒喝」，對於選擇像「仁吉」那樣道路的知識分子，對於殖民者給予的糖衣毒藥早已疲乏的感覺神經，已完全失去警示的作用。因此，無論在吳濁流的後續小說，或在現實的被殖民世界裡，他——「仁吉」的奴性不滅形象，都成為一再出現的鮮明典型，<sup>93</sup>舉凡〈先生媽〉、〈陳大人〉、〈糖扞仔〉等，皆可以窺見「仁吉」的身影。

而〈先生媽〉的主人翁呈現了 2 個極端且對立的角色：一方是御用士紳，同時也是地方公醫的「錢新發」，他努力響應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並對通過「國語家庭」的推薦、更改日本姓名等數典望祖的行徑而自鳴得意；另一方則是他堅守民族傳統，維持漢人習俗，口說台灣話、身穿台灣服的母親「先生媽」。「錢新發」非但時常身體力行，研究日本生活，實現日本精神，而且也努力指導家族成員「成為日本人」，除了注意外在表象的姓名、衣著、住所之外，舉凡喝茶、走路、娛樂、應酬作法等內在行為模式，無一不予以「日本化」，與此同時，對於其他地方人士也陸續更改日本姓名的「日本化」行為，卻又抱持著鄙視與抵制的態度與立場，除了個人的自尊心大受影響外，亦深恐其「日本人」的優勢身

<sup>93</sup> 葉石濤，「吳濁流論」，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頁 272-273。

分與地位受到撼動，甚至被取代，因此，他憂心忡忡地認為：「改姓名就是台灣人無上的光榮，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樣，沒有遜色。一旦改了姓名，和日本人一樣，絲毫無差。然而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改了姓名。他迄今的努力，終歸水泡，覺得身分一瀉千里，如墜泥濘中，竟沒有法子可拔」。<sup>94</sup>這裡，可以看出「錢新發」所代表的台灣「御用士紳」之虛偽與奴性，同時也顯現殖民當局在「皇民化」末期推動的「改姓名」、「國語家庭」等運動，所欲達到將台灣人轉變「成為日本人」而不求「內在質量」只求「外在數量」的假面，從而也能輕易察覺出日本戰敗的徵候了。

## (二) 〈陳大人〉

吳濁流在〈陳大人〉中所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另一種「御用士紳」的嘴臉。文本的主人翁「陳英慶」，只因在殖民當局謀得一個「巡查補」（相當於副警察）的一官半職，便仗勢著日本殖民者的撐腰，搖身一變，成為虎作倀、六親不認、橫行無阻、魚肉鄉民的大惡霸。台灣的一般民眾，習慣上稱呼巡查為「大人」，由於警察大人是能「任意罰人、隨便拿人、自由打人」，因此民眾普遍感覺著警察大人都是無理可講的惡人，同時也相當害怕「警察眼」。<sup>95</sup>而「陳大人」最可悲之處，就在於其必須較之日本巡查，更為嚴厲、高壓地貫徹殖民政策，藉以向殖民者展示其「政治正確」的標誌，甚至還任意辱罵看不順眼的地方民眾：「你們這樣的清國奴如何配做日本國民」；<sup>96</sup>而文本中也描述了日本支廳長的醜陋嘴臉，即便只是為了強奪豪取地方士紳的古董花瓶，亦不吝惜動用殖民者的「軍威」：「不喜歡日本政治的人，趕快回支那去。假使有輕舉妄動的人，我有這柄日本刀，可以制裁」、「假使你們全島的台灣人妄動起來，日本有槍，有大砲，有軍艦，任你們去幹都不怕」，<sup>97</sup>充分地展現了殖民當局採取「軍事鎮壓」與「同化政策」兩手策略的絕對支配主義之特性。此外，令人諷刺的是，「陳大人」頭上那頂「日本天皇陛下所賜」的烏紗帽，因為其貪得無厭，食髓知味，三番兩次向廟會勒索錢財，令廟會管理人員不得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是賄賂了新來的日本巡官，再賄賂日本支廳長，如此上下夾攻，一經告發，便攆掉了「陳大人」的烏紗帽，在此官帽不過是官帽，誰戴都可以，可以被放在「陳大人」

<sup>94</sup> 吳濁流，「先生媽」，彭瑞金編，前引書，頁 31。

<sup>95</sup> 「只怕警察眼」，*台灣民報*，第 106 號（大正 15 年 5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9。

<sup>96</sup> 吳濁流，「陳大人」，彭瑞金編，前引書，頁 48。

<sup>97</sup> 吳濁流，「陳大人」，彭瑞金編，前引書，頁 43。

的頭頂上，同時也可以隨時被摘掉，<sup>98</sup>其中考量之因素，端看殖民主的「承認」與否為最重要之關鍵。

### (三) 《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以故事的鋪陳與張力來看，較多數台灣籍作家僅處理「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的認同糾纏，增加了與多數台灣住民的原鄉——「中國人」之間的認同矛盾，因此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經典之作而當之無愧，這也是探討自我／他者相關問題的重要參考座標，本文將在第五章進一步申述之。

《亞細亞的孤兒》的主人翁「胡太明」，出生於舊式地主家庭，其雖受祖父儒家思想的身教薰陶，但幾經殖民教育的洗禮，亦完全認同殖民者的文化。只是在受到所愛戀日籍女教員同事「內籐久子」的拒絕中，才初次體驗到民族之間的「差別」，此種「差別」並非只是單純的人種差別歧視，實則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差別歧視。殖民當局所造成的「差別」，當然還呈現在台灣住民的成長過程之中，舉凡住民的教育權、求職權、參政權等等，但此時的「太明」在意識形態上，還無法與殖民者作斷然地決裂，甚至為了「忘記過去的一切，到日本去留學，打開自己新生的扉頁」，<sup>99</sup>且為自己的選擇而豁然開朗起來。然而，他到了東京之後，依然發現此等差別歧視，仍如影隨形般地環侍在側，諷刺的是，歧視有時來自於「日本人」，有時卻是「中國人」所給予的，從而也印證了萌生日本留學念頭之初，友人對他的忠告：「台灣人到任何地方，依舊是台灣人，到處受人歧視，尤其是中國大陸，因為排日風氣盛行，對台灣人也極不歡迎」，<sup>100</sup>因此希望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樣的單純告白竟變成一件不被討好之事。

而在「太明」學成返台，奔走求職之際，亦發現自己只不過成為受鄉民揶揄的「高等遊民」罷了，<sup>101</sup>因此他夢想著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以便讓自己從這個痛苦中解脫出來，因緣際會下，他接受友人邀請，橫渡隔海前往了大陸南京，然而在登岸之初，卻得到友人的同樣叮嚀：「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人都不會信任我們。……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自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受這種待遇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必須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

<sup>98</sup> 顏元叔，「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http://www.taiconet.com.tw/Lukacs/TWJP.htm>。

<sup>99</sup>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頁62。

<sup>100</sup> 吳濁流，前引書，頁54。

<sup>101</sup> 陳映真，「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前引書，頁48。

子』，我們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並不落人之後」，<sup>102</sup>而這份熱情到頭來卻只能「犧牲」在中國的監禁之中，究其原因也只是他所擁有不被信任的「台灣人」身分而已。「太明」後來雖然得到昔日學生之助，越獄逃往上海，對於自己的命運遭遇，竟像學生姐夫「李」先生所一語道破「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任何一方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個孤兒」般而不勝唏噓，<sup>103</sup>當他費盡萬苦千辛返抵台灣，這回迎接他的是殖民當局的特務與警察之監視。

正當「太明」再次慶幸歷劫歸來之際，盧溝橋事變爆發，「皇民化」運動的狂潮亦隨著戰爭的節奏而強力席捲台灣。期間，一部分台灣住民的「皇民派」，努力學習日語、更名改姓、參加「志願兵」等等，設想熬過這段過渡時期，「就可以做個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了」，但他們似乎「忘記了本國的歷史傳統，一味希望『皇民化』，妄想那樣便可以為子孫謀幸福……。可是，外表縱使能『皇民化』，最後還有血統問題應該怎麼解決呢？」，<sup>104</sup>而「皇民派」的悲哀，更在於認為自己之所以無法順利入學、求職、升遷等等，是由於「皇民化」不夠徹底所致，在此種思維之下，普遍就對「本島人」妄自尊大，反之，對「內地人」則卑躬屈膝，因而失去了「自我」，到頭來「皇民化」無非是一齣「人間活劇」而已。<sup>105</sup>儘管如此，對於「皇民化」的影響，「太明」卻有獨到的見解：「『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他們唯其因為與鄉土共生死，所以決不致為他人所動搖。反之，那些游移騎牆的『皇民派』，卻非常容易動搖，因為他們易為物慾所動，他們是無根的浮萍；他們的力量看來雖然大，其實不然，微風、碎浪便可以使他們漂流失所的」，<sup>106</sup>只是，在他經過半生的波折，終於理解庶民群眾結合土地而產生的那股「沛然莫之能馭」力量從何而來之際，此外也應該能夠明白，他雖然不算真正的「皇民派」，卻仍游移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且對歷史的全貌與取向沒有全局性之瞭解，才是自己認同上矛盾與苦悶的根源所在。<sup>107</sup>也因此，最後戰時體制深化了「太明」無法自主的「命運」而終於「發瘋」了。

<sup>102</sup> 吳濁流，前引書，頁 120。

<sup>103</sup> 吳濁流，前引書，頁 181。

<sup>104</sup> 吳濁流，前引書，頁 212、228。

<sup>105</sup> 吳濁流，前引書，頁 213。

<sup>106</sup> 吳濁流，前引書，頁 229-230。

<sup>107</sup> 陳映真，「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前引書，頁 60。

綜上所述，從〈水月〉、〈先生媽〉、〈陳大人〉到《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的文學文本，描述了台灣住民的「中國人意識」、「日本人（皇民）意識」，以及「台灣人意識」的轉變樣態，亦處理了台灣住民無可避免地陷入的「多重認同」之糾纏，此種糾纏終其戰爭結束之前，都未能有解脫之良方。因此，他的無奈，也是所有共同背景下，台灣住民內心、精神掙扎的共同心聲。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檢視了日本殖民帝國在台灣所推動「同化」與「皇民化」的論述與操作，其中的「皇民化」論述，最重要的是將「皇民」、「日本化」、「成為日本人」內化為被殖民者唯一的問題意識。而對於台灣「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所做的內容分析，雖然輿論發布的時間集中涵蓋在殖民政策較為寬鬆的「同化政策時期」，與本文更想探討「皇民化時期」的輿論市場有所差距，惟從中還是能得到此一時期媒體輿論所關注的焦點議題，包括：「文明強弱的辯證」、「對台總督的期望」、「『同化政策』的抵制」、「『一視同仁』的假象」、「追求自治的渴望」、「主張平等的教育」、「創造全新的自我」等，同時這也可以視為台人對日本「皇國／民」的初期想像。

最後從「皇民化時期」所出版具有代表性的台灣文學作品，嘗試藉由文學、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視野中，拼湊出對自我／他者的想像與認知圖景。而這些知識分子所呈現的圖景輪廓為何呢？首先即是，失去承認的「主體」；其次是，多重認同的糾纏；第三是，精神意識的「異化」；第四是，至死方休的悲鳴等。同時，也因為產生如此的圖景輪廓，可以說造成了台灣住民在心靈、精神層面前所未有的斬傷，其影響力與後遺症似乎流傳迄今。而關於上述初步的分析，本文將在第五章作進一步探討。